

诗人穆勒

黄 淳

内容提要 约翰·穆勒长期以来背负着功利主义“逻辑机器”的称号，他的文学观很少得到关注，其作品的“文学性”也时时遭受质疑。本文从《论边沁》和《论柯尔律治》两篇文章入手分析穆勒对两位哲人的形象塑造，以展现他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达和在意象运用上的深厚功底。结合他早年的论文，特别是《关于诗歌及其种类的思考》和《丁尼生诗评》，我们还可以发现，穆勒对意象和情感的强调都根植于他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在他看来，理想的诗人以“情”传“情”，用鲜明的意象和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传达真理，塑造人性，而这些也正是穆勒本人在写作中不懈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 约翰·穆勒 《论边沁》 《论柯尔律治》 理想诗人

约翰·穆勒，又译约翰·密尔，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1899年严复翻译介绍《群己权界论》，这位天才的英国学者也由此走进中国人的视野。此后一百多年里，他的作品被不断翻译、重译、出版、再版。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到心理学，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这个名字以及它所代表的观念耳熟能详。不仅如此，穆勒甚至还是19世纪英国文学课本的必读作家，中外皆然。然而这里有个小问题：既然穆勒一不写诗歌，二不写戏剧，三不写小说美文，那么，他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作家”？针对这种来自“文学本体论”的质疑，我们也许会有两种答案：第一，从大处说，穆勒对19世纪英国社会思想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遍及文化的方方面面，学文学的人不可不对他有所了解；第二，从小处说，穆勒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自传》(Autobiography)完全可以作为传记文学来研究，如此一来，作者穆勒当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作家”的角色。以上两个答案，无论哪个都可以成为穆勒“文学性”的有力辩词，可眼下这篇文章要做的，是为辩护提供第三种可能性：直截了当地谈谈穆勒的“文学性”。

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从遣词造句的角度走近穆勒——通常情况下，大家更关注他说出了什么，至于他怎么说的，似乎无关紧要。若是看了严复对《群己权界论》英文原作 *On Liberty* 的八字评语“文理颇深，意繁句重”，^①文学爱好者对他的兴趣想必会更淡了一层。其实，不仅中国读者有如此印象，在西方，甚至英语世界里，所谓“穆勒的文学成就”，依然是个带问号的命题。当然，由于母语的关系，西方学者大都不会觉得穆勒“意繁句重”；恰

恰相反，很多人认为穆勒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度理性。于是乎，喜爱穆勒的研究者大赞特赞他的 lucidity: 逻辑清晰、文风干净、直白而不做作；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譬如王尔德和尼采——便高声抱怨穆勒的 insulting clarity，甚至将他的作品与古希腊诗歌悲剧放在一起比较，试图制造一个“高下立判”的效果，好把前者彻底挤出书单。^② 拥趸也罢，排斥也罢，大家似乎都认定穆勒是个重逻辑、轻修饰的作者。对于这样一种风格，还有从文学角度剖析的必要么？一个大大的疑问由此产生。

一、意象与情感：穆勒笔下的人物

本文的第一个任务，是展现穆勒作品中富有文学色彩的一面。事实上，这位以理性著称的逻辑学家在遣词造句上功力深厚，他可以用极富文学性的方式，通过各种形象的方式，戏剧化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有时甚至很有点煽动性。在这一点上，《论边沁》和《论柯尔律治》堪称典范。《论边沁》发表在1838年8月的《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 上，穆勒的导师哲罗姆·边沁(Jeremy Bentham) 和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于1832和1836年相继离世。他们是穆勒生命中最重要的长辈。边沁创立了功利主义学说，詹姆斯则是该学说最忠实最坚定的支持者，穆勒自幼年起得到两位长辈的悉心栽培，所以出道伊始便一直被视作功利主义的正统传人。然而，这位继承人并没有完全按照师长预先设定的轨道前进。成年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功利主义思想，一面总结经验一面寻找自己的立场和声音。在这个背景下写就的《论边沁》，便具有了悼念、总结与反思的多重意义。

穆勒首先肯定了边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后者的质疑精神和挑战传统的勇气。在这里，他并没有平铺直叙地列举贡献，而是像画家那样，一笔一笔细细勾勒边沁的形象与气质。首

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名钢铁战士般的边沁：他是“颠覆性”的思想家，他敢于“明目张胆地对英国宪法或法律表示不屑”，他“反驳不合逻辑的论证、曝光诡辩、发现矛盾和荒谬”。^③ 谈到边沁在英国思想史的上位置，穆勒更是反复强调，他的声名来自于不懈的“战斗”：

即使边沁没有旁的功绩，他对实践中各种错谬的批判和驳斥也足以奠定他在思想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坚持不懈地战斗着。他的许多辛辣的章节，甚至一些长篇幅的精品，都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就。^④

中文译作“批判”和“驳斥”，但是在原文里，穆勒用的却是简单明了的 war, conflict 和 warfare。短短三句话里，“战斗”、“战争”、“战事”接连出现，再加上几个鲜明有力的形容词——without intermission, piquant 和 entire——点出战事之长久与猛烈，边沁冲锋陷阵的勇猛形象立时跃然纸上。他就是这样，以学识作武器，以思想为弹药，向一切错误发起攻击。

除了“错误”或“谬误”等抽象的概念，边沁的对手还包括一个个具体的人。于是，我们通过穆勒的描绘看到边沁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尖锐对立：

他们“破”而边沁“立”；他们只批判错误，边沁却非要在寻到真理之后才着手批判。他们重分析，边沁重综合。他们从流俗旧观念入手，细细研究其逻辑，待到认定其基础有失误后便大加批判；边沁却要创新，依照自己的学说挖好基础、筑好结构，而后邀请大家品评新旧；当解决了问题，或者说，当边沁认为自己解决了问题之后，他才会大声宣布，除了自己的观

念,旁的都是谬误。^⑤

这一连串对比中只有三个完整的句子,可是从材料到节奏,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前两句开门见山,道出边沁与对手的区别:边沁是“他”,对手是“他们”;边沁是“立”,对手是“破”;边沁是“综合的”,对手是“分析的”。黑白分明的对比与节奏感分明的句式,几乎模拟出短兵相接的战场效果。待到最后一句,穆勒不失时机地抓住重点,充分展开,详尽解说边沁和对手在思维方式上的本质区别。他一边描述,一边还继续在字眼上加强对比——他们循“流俗”(received),边沁重“创新”(de novo);他们以前人成果为基础并研究之(dug around it),边沁却要以自家学说为根基,一旦论证成立,就会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宣布,真理只在他手中,别家的都是谬误。

作为一名思想导师,边沁的勇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穆勒告诉我们,他在寻找旁人失误时“洞若观火”(keenest detector),宣扬自己观点时则是名副其实的“铁嘴钢牙”(hardiest assertor);当公众不能很好地领会他的意图时,边沁绝不试图取悦大家,而是“对于那些坚拒其影响的人,先把自己的原则一条接一条地渗透到他们的头脑中,然后再驱逐那些头脑中的偏见和无知”。^⑥“渗透”(infiltration)和“驱逐”(driving)都是典型的军事术语。有了这个联想,我们仿佛能够亲眼目睹边沁利用战术,先潜行到“敌方”头脑之内,而后大举进攻,一鼓作气消灭敌人的无知和偏见。不仅如此,这些描述在形象生动之外还有另一层重要涵义,那就是,它强化了边沁与读者的对立,特别是与那些对他的观点不抱兴趣的人。彼此不感兴趣,并不意味着两人就一定针锋相对,但这一系列军事用语却让读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侵略者”边沁所抱持的理念:非我徒众,就必须尽快征服。

然而更加有趣的是,战士并不是边沁唯一的形象。谈到边沁的功绩时,穆勒还这样补充道:他的成就“远远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辉煌,他对自身功勋的想象完全基于孩子气的天真和乐观”。^⑦“孩童”这个譬喻并非穆勒偶然为之。如果我们细读原文就会发现,在这篇文章中,“孩子似的边沁”与“战士般的边沁”占据了几乎相当的篇幅,是主人公肖像中最明显的两大特征。穆勒的另一段概括或许更有代表性:

边沁对人性的理解是有限的。他的理解是纯粹的经验主义,而且是那种其实并没有多少经验为依据的经验主义。边沁一生经历平静而顺遂,内心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因此他在身心两方面的体验都少得可怜。他不知奢华,也不识贫苦,不懂饥渴,也不解饱足;他甚至不曾体会病痛。无论是童年时代,还是85岁高龄,边沁始终保有少年人的健壮。他从不沮丧也从未消沉。生活于他,向来不是一件苦差事。自始至终,边沁就是一个孩子。^⑧

穆勒一直奉边沁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可从上面这段文字看来,原本热情洋溢的赞赏中蓦然间有了些春秋笔法的味道。天真也许是个美德,但“孩子气”(boyish)绝对不是什么赞语;说一位本该成熟而睿智的思想家缺少身心体验,自始至终“一团孩子气”,对人性也认识有限,这是褒是贬,读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

不仅如此,“孩子”的譬喻还和前文的“战士”形象巧妙地交融。表面看来,两种形象相互冲突,但细细品来,这种冲突恰恰是穆勒的高明所在。一眼看上去,冲锋陷阵的斗士与天真烂漫的儿童在气质上格格不入,但他们却有个微妙的共同点,那就是,任性冲动。战士因为勇武而任性冲动,所以边沁树敌颇多,

随时随地向对手发起猛攻；孩童因为无知而任性冲动，所以边沁固守一隅，试图以自身有限的经验去解释各种复杂的观念和现象。他像一名战士一样，缺少对不同观点的包容，也像一名幼儿一样，热切地表达自我却忽视了交流和理解。穆勒正是以一人双面的描绘技法，用两张看起来截然不同的面孔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凸显边沁自负任性的缺点。假如勇气与天赋不能与成熟的心智相结合，这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穆勒并没有大篇幅探讨所谓的严重后果——毕竟，作为功利主义的传人，他有“为尊者讳”的责任，也必须考虑到边沁拥趸者的感受。但无论怎样掩饰，他的描绘都已足够清晰地传达出自己的立场。类似的手法在《论边沁》的姊妹篇《论柯尔律治》里也被使用得淋漓尽致。穆勒曾经声称，边沁与柯尔律治的思想彼此互为补充，可如果我们对比两篇文章就会发现，所谓“补充”，不过是对边沁的委婉批评。在穆勒笔下，柯尔律治拥有边沁所不具备的各种优点：既不好勇斗狠，也不幼稚自私，集导师和智者为一体——而且还是一位内心温柔的思想家。

柯尔律治的角色不可谓不丰富，他是诗人也是哲学家，还在宗教思想上颇有建树。可无论描绘哪种角色，穆勒都会要特别强调他的“导师”特质。作为哲学家，柯尔律治不遗余力地向大众“传播”（promulgated）自己的观点；作为诗人，他向读者们介绍“更加健康的品味和更加经典有见地的诗歌评论”。^⑨但与边沁不同，柯尔律治并不是一个孤高冷傲的进攻型布道者。为自由批评圣经的权力而斗争时，他会“真挚地大声疾呼”；对于清教神学中显而易见的错误，他也会“愁容满面”，夙夜忧叹。^⑩

可最有意思的还是《论柯尔律治》一开头对主人公的整体评价。穆勒说“众所周知，柯尔律治曾在有生之年写下这些思考，我们虔

诚地希望，这些重要的观念能在某一天泽被后人。”^⑪有意强调这位名人与读者的时空差距，为主人公公平添几分厚重的历史感。与历史感相伴随的是权威。紧接着，穆勒笔锋一荡，将话题引向18世纪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今世几乎没有诗人，遑论优秀的诗人；研究哲学的人大多干瘪乏味，根本没有足够的情感素材，自然也就不能够领会人类情感的复杂与神秘；这些复杂而神秘的元素要么被排斥在他们的理论之外，要么被干巴巴地解释一番，对于深知情感为何物的人来说，那种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⑫

穆勒感叹道，这是一个“真情缺失”的时代（without earnestness），人们普遍“缺少深沉而强烈的情感，也因之没有了沉思的习惯”。^⑬“缺少”是这段文字的关键词，一连串的否定令18世纪的哲学研究看起来仿佛一片不毛之地。这是穆勒给18世纪的断语，也是柯尔律治出场的前奏。紧接着，大幕徐徐拉开，我们看到主人公以拯救者的姿态屹立在舞台中央：18世纪的哲学缺少优秀诗人，柯尔律治恰恰是个天生的诗人；18世纪的哲学缺少意趣盎然的研究，柯尔律治恰好有广阔的视野；18世纪的哲学缺少足够的情感素材、缺少对情感复杂性和神秘性的认识，而柯尔律治恰好有着丰富的内心、智慧的头脑和无与伦比的直觉力。总而言之，按穆勒所说，柯尔律治与18世纪哲学，简直就是“有”与“无”的完美对比。

柯尔律治与边沁的形象也由此构成完美对比。正如穆勒所概括的：

面对那些传统观念时，边沁要求大家发问：它是否正确？柯尔律治则引导众人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他们两人一个立足于传统之外，以陌生人的视角端详打量；

另一个却要立足于传统之内,以信徒的姿态观察检视,力图发现传统观念的起源并了解它长久以来被人信奉的原因——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才是对经验的正确解读。^⑭

接着,穆勒总结道,作为时代思想家的“竞争者”,边沁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向众人发起挑战,柯尔律治却摒弃个人好恶,探寻各种观念存在的原因,为后人指明道路。边沁是天真勇猛却缺少同情心和理解力的斗士,柯尔律治则是温和细腻的良师。^⑮尽管穆勒将二者并称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经过如此一番生动的塑造和鲜明的对比,孰高孰低,不言而喻。

二、以“情”传“情”:穆勒的文学观

通过细读《论边沁》和《论柯尔律治》,我们已经看到,穆勒远非像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重逻辑轻修饰、重文理轻感性。他的文字既是论述,也有描摹:鲜明的意象是边沁和柯尔律治两幅画像共有的技法,对情感重视与否则是穆勒褒贬人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一些学者也曾关注穆勒文字的这些特征。例如批评家尤金·奥古斯特就曾借鉴约翰·霍洛威关于“维多利亚智者”(Victorian Sage)的研究,分析穆勒对边沁的描述,认为穆勒的文章以逻辑为表,以情感为里,真正做到了以情说理。^⑯遗憾的是,奥古斯特的文章简短,只举《论边沁》一篇文章的个别段落为例,而且侧重分析技法,没有特别探讨“情感”因素在人物评价中的重要性。本文希望能够透过前文的分析做些补充,更全面地展现这个逻辑学家对意象的热衷和对情感的强调。行文至此,另外一个问题也就产生了:穆勒对意象的热衷和对情感的强调究竟来自何处?

如果联系到他的成长史,这个问题就显得

更有趣了。前面说过,穆勒的父亲詹姆斯和导师边沁都是英国功利主义学说的领军人物。自幼年起,他的教育便由这两位精心设计、亲手打造。按照《自传》里的说法,穆勒三岁学希腊文,八岁学拉丁文,少年时期在数学、历史、逻辑、植物学上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学习科目之多、要求之严,令人咂舌。曾有研究者估计,在穆勒还是个十几岁少年的时候,所阅读的书籍总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今天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功利主义先驱们设计出的教育方案也并非尽善尽美,有一个领域他们始终没有涉足——不仅不涉足,还会时不时地表示下轻蔑。这个领域,就是文学。轻视文艺是功利主义的一大特征。边沁曾有名言:

音乐与诗作蕴含的价值和图钉所蕴含的并无二致;如果图钉游戏能够带来更多快乐,那么它就好比诗歌或者音乐都更有价值……事实上,诗歌——从本性上来说——总是站在真理的对立面上,它包含的是虚构的内容,宣扬的是虚假的道理。诗人们追求的,总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⑰

言语间对诗歌乃至文学的鄙薄一览无余。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师父教出来的徒弟,十有八九会是个逻辑机器;事实上,“逻辑机器”正是过去很多研究者给穆勒贴的标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穆勒早期的作品就会发现,这位大众眼中一板一眼的逻辑学家对文字和诗歌都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前文所提到边沁与柯尔律治生动的形象,其实正源自他本人对文学本质的认真思考和深刻理解。

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穆勒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论自由》、《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逻辑学体系》等等日后将为他带来崇高声誉的作品此时尚未问世。这个时

候，穆勒关注的话题，除了政治经济之外，还有诗歌。19世纪20年代中期，穆勒和朋友们创建了伦敦辩论协会（London Debating Society），经常参与各种辩论活动。从当时留下的记录可以看到，辩论的话题多种多样，文学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穆勒参与的题目包括“论当下文学”（On the Present State of Literature）、“完美性”（Perfectibility）以及华兹华斯和拜伦的比较。虽然具体的辩论内容今天已大多无从查找，但穆勒当年的兴趣所在从这些题目中也可略窥得一二。

说到兴趣所在，穆勒在这一阶段发表的文章也可以与以上论题两相印证。1832年，穆勒写成《什么是诗歌》（What is Poetry）一文，并发表在次年一月的《博学月刊》（*The Monthly Repository*）上；短短十个月后，另一篇《诗歌的两种类型》（On Two Kinds of Poetry）也问世于同一份刊物。1859年穆勒出版个人文集《文与论》（*Dissertation and Discussions*），两篇文章同时在列，而且因为内容相近，被合成一篇，统称《关于诗歌及其种类的思考》（*Thoughts on Poetry and Its Varieties*）。文集本身只有区区两卷，能够入选的，必然都是作者心目中的代表作，诗歌这个话题对穆勒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关于诗歌及其种类的思考》探讨了两大问题：第一，什么是诗歌？第二，什么是诗人？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一个别具一格的诗歌定义。穆勒认为，“情感”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唯一关键因素：

诗的目的在于作用于情感；由于这一点，与诗歌有较大区别的并非散文，而是事实或科学。它们一个关注信仰，一个关注感情；一个摆事实讲道理，一个却力求打动人心；一个提出建议，诉诸理性，另一个强调趣味，诉诸感性。^⑮

当时关于诗歌定义的讨论为数众多，但大部分人还是会把侧重点放在其特殊的音韵形式上。

比如纽曼（John Henry Newman）就曾有论断，外在的韵律是诗歌的特有品质。^⑯穆勒显然不那么认为，对他来说，“诗歌”一词所指代的，与其说是一种体裁，倒不如说是一种品质。即使一篇散文，只要能够触及内心、以情动人，也完全可以算作一首好诗。这个观点在后文得到进一步的阐发，穆勒甚至还提出“诗歌即感情”（Poetry is feeling）。^⑰

情感在诗歌创作中同样至关重要。有些人认为要写好诗必须技巧纯熟，也有人认为丰富的想象力才是关键所在；可在穆勒看来，这些和诗歌韵律一样，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仍是情感。诗歌属于所有人，真情自然流露的瞬间，人人都是诗人。

一个人也许能写一手好诗，却未必被认作诗人，因为每一个让人类情感流淌笔尖的人，都是在作诗。所有人——即使那些想象力最贫乏的人——在情感迸发的瞬间，也可以吟唱诗篇……所谓诗歌，不正是饱含深情的思想和语言？大多数人，在某个场合某个瞬间，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诗歌都是信手拈来。^⑱

然而，人人能有创作诗歌的可能，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理想的诗人。理想的诗人必须有能力强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够以情感为桥梁，与人交流、予人启迪。穆勒把这样一个理想的诗人描述为“哲人诗人”（philosopher-poet），并解释道：“哲人诗人坚持不懈运用自身强大而积极的影响力，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出许许多多明智优雅、充满活力年轻头脑。”^⑲诗歌不再指代一种文学体裁，“诗人”也不再仅仅是一种职业。在穆勒看来，文字不仅要载道，也要传情；理想的诗人——或者说，理想状态下任何一种表达——都必须逻辑家和诗家的完美结

合,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不仅要文采斐然,更要擅用意象,富于情感,方能传达真理,教化苍生。

穆勒对文学的思考在他的一篇诗评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1835年,他为一位叫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诗人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发表在当年的《伦敦评论》(*London Review*)上。这个丁尼生,便是日后名满天下的英国桂冠诗人。可在1835年,他还籍籍无名——更要命的是,他的作品刚刚在几个大牌文艺刊物如《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和《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上惨遭滑铁卢。此时,当世人还未看清丁尼生的天才时,是穆勒早早站了出来,成为他最重要也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篇诗评里,穆勒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评价诗作的形式、韵律甚至内涵。他特别关注的是艺术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丁尼生对意象(image)的运用。大段大段的引用和评论都围绕“意象”展开。穆勒说,评价一首诗,最重要的就是意象和感情,这二者相辅相成,构成诗歌最本质的特征。他认为,丁尼生最大的长处是精于景象描绘(scene-painting):

不仅是描述性诗歌里通常展现出的构图能力——这几卷作品中没有任何一段是单纯的描写,而是编织意象的能力。这些意象能够准确反映人类的情感,从而成为情感的完美象征。凭借这种能力,诗人才能激发情感,直指人心,让作品迸发出与现实相当的力量。^③

可见,意象鲜明与否,才是穆勒品评诗歌的关键依据。他挑选出的诗作几乎都是日后丁尼生广为人称道的代表作品,例如《玛丽安娜》(*Mariana*)和《夏洛特女郎传奇》(*The Legend of the Lady of Shalott*),而且为了说明

丰满的意象与情感对优秀的诗作不可或缺,甚至不惜篇幅全文引用。分析《玛丽安娜》时,穆勒说道,这首诗的女主人公名字也许会让读者联想到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里那个被遗弃的新娘,但丁尼生的诗作中最突出的并不是对“遗弃”这个事件的叙述,而是对情境的精彩再现。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可锈迹斑驳的门闩、青苔遍布的石墙、万籁俱静中听风掠过树梢的呼啸声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呈现出主人公凄凉孤独的处境,也让读者感同身受。分析《夏洛特女郎传奇》时,穆勒特别指出,这首诗是文字和形象的完美结合,读者应当关注它“轮廓之优美”(statuesque)。他还补充道,文字与形象兼具是很困难的,前者意态朦胧,后者力求清晰;然而,一旦二者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的效果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这样的意象不仅生动,而且鲜明,寥寥几笔便能让描摹的对象呼之欲出。^④

鲜明的意象为什么如此不可或缺?因为它们承载并传递情感,是诗歌打动心灵的关键所在。在论边沁和柯尔律治的文章里,穆勒就曾提到,丰富的情感和对情感的理解力,是柯尔律治胜过边沁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优秀思想家必不可少的特质。类似的观点在丁尼生诗评中也可以找到。穆勒看到了诗人丰沛的情感和技巧娴熟的表达,但是也看到了诗人的不足:在个别情况下过分受制于韵律的暴政(tyranny of rhyme),不能放开手脚专注于表达情感。^⑤在同时代的诗歌批评中,韵律仍然是批评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前面提到的纽曼便是评论家中的代表,另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他的诗歌颇有深度,但就是因为韵律不工,常被诟病,在当时的诗评家那里吃尽了苦头。穆勒视韵律如暴君,无疑是在高调重申自己在文学上的原则和立场。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一个关于文学的“终极问题”: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他自问自答道:诗歌的本质有二,其一,从目的上来

说，诗歌要以情感为途径，塑造人的欲求和品质，帮助他们发掘内心最甜美的一面；^⑨其二，从内容上来说，诗歌要做到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既要被头脑理解（understood），又要打动心灵（sympathised）。^⑩如果要给出一个更简单的概括，穆勒的手法或许可以被描述为以“情”传“情”，前一个“情”是与鲜明意象相结合的情感，后一个“情”则是他为工业和功利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世界开出的一剂药方，其上寄托了他对人性、对道德、对社会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愿望。

有了这个认识，再回头比照穆勒自己所写的《论边沁》和《论柯尔律治》，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强烈的“文学”内涵。那些战士、孩童和导师的生动概括不是一时兴起，边沁和柯尔律治的高下之较也并非穆勒偶尔为之，形象塑造与委婉的褒贬都根植于穆勒的文学观。无论把边沁描绘成战士兼儿童，还是强调柯尔律治的导师形象，他都在追求优美的“轮廓”、鲜明的意象和生动的效果；而耗费这番心血的目的是，便是准确无误地传递思想，帮读者认识到功利主义的不足之处，发现情感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进而——借用穆勒自己的话——塑造人的品格，发掘内心的甜美。所以说，这两篇文章虽然看似没有多少文学性，其中却包含了穆勒对文学的独特见解，更是他实践自身文学理念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他对理想诗人所提出的要求：文采斐然、善用意

象、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传达真理、教化苍生等等，桩桩件件，自己都做到了。据此给穆勒一个“诗人”的称号，当是实至名归。

注释：

- ①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3页。
- ② 转引自 Julia Prewitt Brown, *Cosmopolitan Criticism: Oscar Wilde's Philosophy of Art*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120页。
- ③④⑤⑥⑦⑧ John Stuart Mill, "Bentham",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Vol. 1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75), p. 332, p. 337, p. 347, pp. 354-355.
- ⑨⑩⑪⑫⑬⑭⑮ John Stuart Mill, "Coleridge",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Vol. 1, p. 398, p. 463, pp. 463-464, p. 430, pp. 394-395.
- ⑯ Eugene R. August, "Mill as a Sage: The Essay on Bentham", *PMLA* 89 (1974), p. 142.
- ⑰ Jeremy Bentham, *Rationale of Reward* (London: John and H. L. Hunt, 1825), p. 206.
- ⑱⑲⑳㉑㉒ John Stuart Mill, "Thoughts on Poetry and Its Varieties", *Autobiography and Literary Essays,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1, eds. John M. Robson and Jack Stillinger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81), p. 346, p. 348, p. 356, p. 358.
- ⑳ John Henry Newman, *Poetry, with Reference to Aristotle Poetics* (Boston: Ginn & Company, 1891), p. 25.
- ㉓㉔㉕㉖㉗ John Stuart Mill, "Tennyson's Poems", *Autobiography and Literary Essays*, p. 399, p. 408, p. 401, p. 414, p. 413.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英语系）

责任编辑：何卫

英文提要

Hermeneutics as a Cultural Practice:

On Hirsch's Critique of "Indeterminacy" and His Humanistic Tenet

PANG Hong

American scholar Hirsch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in hermeneutic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 Hirsch's hermeneutics is not only a simpl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 but also relates to a more vivid dimension of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background of Hirsch's theory is the wide popularization of nihil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and the aim of his theory is to criticize the view that consensus is impossible to be reached and meaning is indeterminate (i. e. the so-called "atheism"), and to show his "agnostic" view of the determinacy of meaning. Fundamentally,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of Hirsch's hermeneutics is an earnest appeal for the spirit of humanism.

Racial Performativity: A Study on the Paradigm of Ethnic Literary Criticism

WANG Jianhui

By a brief survey of the contemporary performativity theor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explores and demonstrates the traits of racial performativ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racial performativity, and between racial performativity and the ethnic literary criticism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a critical paradigm of racial performativity in the field of ethnic literary criticism.

Mill as a Poet

HUANG Chun

Known as a utilitarian "thinking machine", John Stuart Mill has attracted little interest from those concerned with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is even viewed as a dubious character in literary studies. The present paper,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his essays "Bentham" and "Coleridge",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Mill's subtleties as a writer, his skillful use of imagery and his emphasis on "feeling".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the role which Mill adopts in those essays is quite in keeping with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l poet", who, as is explained in his treaties on literature, should be able to "summon up the state of feeling"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audience and cultivate their character.

Coleridge's Influence on Virginia Woolf's Concept of Androgyny

HUANG Zhongfeng

Androgyn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Virginia Woolf studies, particularly in *A Room of One's Own*. Though Woolf explicitly mentioned S. T. Coleridge's influence on her idea of androgyny, critic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eldom study these two writers side by sid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